



刘东轩烈士传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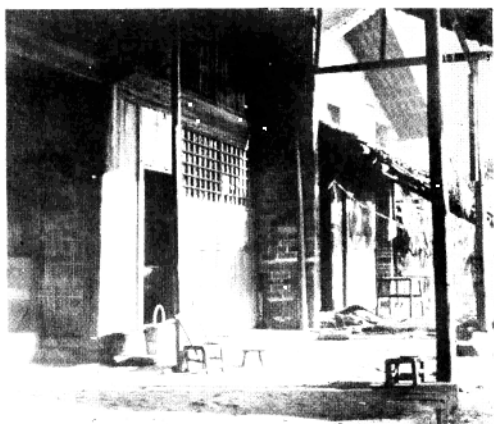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对马野山温泉
 山——山山山
 温泉山山山



山山山山山山山
 山山山山山山山
 山山山山山山山
 山山山山山山山



本江山工人在此写题——黄家戏台，刘赤轩
曾在该处给工人讲过课。



本江山工人俱乐部旧址(模型)



本北农工会旧址
——刘拔三公祠



出版说明

刘东轩烈士(一八九九——一九二八年)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展的湖南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和蒋先云烈士一起领导了水口山铅锌矿最初的工人运动;以后,又在衡山岳北地区,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为湖南早期工农革命运动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大革命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反动派杀害,年仅二十九岁。

为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激励人们在新的长征中英勇战斗,我们特请烈士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水口山矿务局党委宣传部组织编写了本书。作者做了大量采访调查工作,较为系统地记叙了烈士光辉的一生。在写作过程中,烈士的弟弟、退休老干部刘亚球、老干部盛翼联和衡山县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宝贵的意见。

有关烈士的文物图片,因年代久远,均已散失,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书中的烈士像系根据后人回忆画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当风刀霜剑把春天还紧紧地包
围着的时候，报春花就以它那凌霜
斗雪的花蕾，把春讯传送。

人们说：刘东轩烈士就是一枝
革命的报春花。

目 录

第一章 寒凝大地

苦难的生涯·····	(1)
活命的道路·····	(3)
春天的信息·····	(5)

第二章 水口春雷

在人间地狱·····	(8)
大闹油米处·····	(10)
安源寻师傅·····	(13)
真理的灯光·····	(16)
富贵不能淫·····	(19)
威武不能屈·····	(22)

第三章 岳北春晓

春雷滚大地·····	(27)
晓岚港阻运·····	(32)
惩治害人王·····	(36)
在胜利面前·····	(38)
熔炉中锤炼·····	(41)

第四章 俏不争春

革命的一家·····	(47)
欢呼“好得很!”·····	(50)
在群众之中·····	(55)
与日月同辉·····	(58)

第一章 寒凝大地

苦难的生涯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七日，刘东轩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白果一个贫苦的家庭里。

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

刘东轩的祖父共四兄弟，因为家里贫穷得四壁无土，扫地无灰，兄弟四个只有两个讨了老婆，另外两个打单身。东轩出世后，就过继一半给叔祖父刘祥三做孙，以免绝了这一门香火。

刘东轩的祖父住大路边，靠挑脚、抬轿为生。叔祖父刘祥三也是一根扁担，一副箩索，替人挑脚卖力气。俗话说：“要想立得稳，作田就是本。”一九〇四年，东轩的父亲刘安益拿了刘祥三挑脚积攒下来的钱，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地主，佃了二十几亩田。从此，一家人总算有点泥巴上脚了。

地主是个寡婆子，四体不勤，什么事都要佃户去做。安益一家白天要给她作田，晚上要给她挑水；寡婆子回娘家，走亲戚，还得给她抬轿子。一到秋收交租谷，这地老婆要他们把谷子在红火大太阳底下晒上三天，风车车过两次，严格验收后，才能入仓，这样，就是风调雨顺的年成，佃农也吃不上三个月的饱饭；碰上灾年，那就只能借钱清租了。

安益作了两年田，一家人累死累活，生活依然如故，十分困苦，便退了佃，又来到了牛车坝。

牛车坝有户姓杨的地主，是湘省军阀赵恒惕的外婆家。老实

淳朴的刘安益以为这样的“大户”，该不会象寡婆子那样刻薄，便佃了杨家的田耕种。哪知这杨家依仗赵恒惕之势，财大气粗，横行乡里，人们都说，从杨家大门走出来的狗，尾巴都翘得高些。这地主对待佃户十分狠毒，佃户的租金，一文不得少；租谷，一粒也不能拖欠，不然就“送官究办”。杨家的哲学是：“瘦狗也能榨出三两油，何况吃五谷的人呢！”

安益一家走出了狼窝，又掉进了虎穴。东轩虽然年幼，但炎凉的世态，艰苦的生活，促使他早熟。他曾经攀着父亲的谷箩，问道：

“我们种田，为什么谷子要往东家的仓里挑？”

“田是东家的。”父亲答道。

“牛和犁耙也是东家的吗？”

“是的，都是东家的。”

“那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去种田呢？”

“因为他们有钱呀！”父亲叹息着：“牛耕田，马吃谷。世道不平啊！”

东轩一年一年长大。他热爱生活，虽然生活并不热爱他。他在家时，有时把那些破桌烂凳都雕上花纹：藤叶相缠，花枝相衬，宛如流云游丝，百态千姿，博得了乡邻们的赞赏。然而，苦难的岁月，就象一把把无情的刀刃，在他的父母的脸上，镂出了一道道愁苦和怨恨的皱纹！

又隔了两年，安益一家搬到了白果瓦子河，租种着赵霞轩的三十亩田。

他们从这里到那里，从杨家到赵家，却始终跳不出苦难的圈子。

活命的道路

东轩的叔祖父刘祥三，为了积点钱佃田作，连条板凳也舍不得置，土砖上垫个草把子，就算凳子了。没有箱子盛东西，就在土墙上抠个洞，挑脚挣来的几个钱就存在这墙洞里。

当地有个刘干卿，知道祥三积了几个钱。一天，他对祥三说：“钱收在家里生不出崽子来，放钱有息，何不放点出去，也弄几文没有汗气的钱来香香手？”刘祥三是个老实人，信了他的话，借了二十吊钱给他。不料这刘干卿是个骗子。头一年，他送了息钱来；第二年，他不给了；到第三年，他竟然不认账了。这下可把祥三急得团团转，于是打开了官司。地方上一些吃惯了“油水饭”的人乘机跑去敲榨刘干卿。刘干卿不得已，只好拿出一点钱给他们。他们便对刘祥三说：“人凭文书官凭印，刘干卿借了你的钱，你拿得出借据来吗？”刘祥三说：“他是黄天白日来我家借的，我只记了良心账。”这些人听了，摇头冷笑说：“没根没据，就有秦镜高悬，也理不清这宗官司。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官司不了了之，祥三白白地丢掉二十吊钱。他由此得出一条教训：一个人还是要读点诗书，沾点文墨，不然连个借据也不知道写；就是请人家写了，自己目不识丁，不辨真伪，也只能够任人欺压。他和安益合计，咬咬牙，一跺脚，决定拿出那省吃俭用积下的最后一点钱，送东轩去读书。

一九〇六年，东轩进了白果尹家台私塾。

在私塾里，每天，先生正襟危坐在讲台上，领着大家摇头晃脑地念诵诗书。学生们根据先生的抑扬顿挫，在线装的木刻本书上圈点断句。“唱”完了书，学生们又在戒尺的敲击声中，听先生

“之乎也者”地讲那些千百年前看不见的古人和一些“起承转合”、“前呼后应”、“一开一合”、“一折一伏”之类的文章作法。待先生讲得唇干舌枯，精神慵倦，那把戒尺不再响了的时候，学生们便有的睡觉，有的折纸鸟玩，有的把头伸出窗外，看天上变幻的白云……，先生见此情状，往往拈须长叹，规劝大家努力攻书，以便进身仕途，他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尽管先生不止一次地这样开导，东轩觉得这与穷人缺衣少食全不相干。书上不是说，“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吗？但是乡间的穷人们，曾经有谁来“衣之”“食之”呢？那些满腹经纶的“学界泰斗”不过只会在孔夫子面前叩首、阔佬们面前作揖罢了。在这些发黄的书页里，哪能寻得出一条穷人活命的路呀！东轩对这些书本渐渐地不感兴趣了，当然，不用说，他更无心去做那些以“英雄造时势”、“佳节思亲记”、“原道说”为题的无聊文章了。

穷人读书不容易。多少人幻想着“苦读圣人书，经史出良田”，想在孔夫子面前讨点恩惠，把世代相传的穷根刨一刨。安益得知东轩不用功读书，十分伤心和气愤，常常用赶牛的竹尾巴来教训他。东轩毫无怨言，他知道一家人寄托在自己身上的希望，他理解一家人的苦衷。他虽然硬着头皮继续读下去，但心中有着自己的打算和抱负。

一九一一年，东轩考上了刘氏宗祠族学，开始读“洋书”。这些书在他的心上打开了一扇智慧的门窗。他一反过去敷衍塞责的态度，发愤读书。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家境却更坏了。尽管按照父亲的意思，东轩在龙骨水车上写了“风调雨顺”，在扮桶上写了“禾谷满仓”，但这一类吉祥话却并不能排除苦难，家乡年年遭旱，干得山塘堰坝没得一泡蛤蟆尿。庄稼歉收，家里交不起地租，

东轩只得停学回家，象他的祖辈们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度着艰苦的岁月。

每天劳作之余，东轩从不闲过。这时他对医学很感兴趣，每天不顾疲劳，找人学医，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阅读医书，半年之后，居然也能“望、闻、问、切”，行医治病了。他想：这也是“救人”之道吧！

春天的信息

五四运动前后，湖南正处在南北军阀混战时期。北洋政府任命的湖南督军兼省长、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着长沙、岳阳一带；直系军阀吴佩孚进占衡阳；冯玉祥据有常德；南军谭延闿、赵恒惕保有湘南郴、永地区。在这战云密布的湖南大地上，军阀抓丁派款，人民困苦不堪。

一九一六年年初，刘东轩外出谋生，来到长沙，考取了免费的江南兵工学校，学钳工。当时，长沙正处在纷扰动荡之中。帝国主义，特别是日、英帝国主义的货轮、军舰高挂着膏药旗和“米”字旗，在湘江上追风逐浪，耀武扬威。商店里，小摊上，洋货充斥，到处张贴着推销洋货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张督军的“北兵”驻满城内城外，就是省垣各学校，也都成了兵营，教室变成了“讲武堂”。张敬尧为了强化他的战争机器，或刮地皮，或拍卖矿山（标定以二千万元拍卖水口山公矿给美太平洋实业公司，即其一例），就连学校经费也加以克扣，使学校处于停课或半停课状态。江南兵工学校名为半工半读，实则只工不读。

东轩面对这狼奔豕突的局面，忧心如焚。他愤慨地说：“我原以为白果的地主是世界上最狠毒的地主，白果的农民是世界上最

穷苦的农民，哪知道出了白果，还有更甚者啊！”

就在东轩到长沙的第三年，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掀起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湖南各校学生亦相继罢课，并由自发斗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救国十人团”、“讲演团”、“各界联合会”等组织遍及省城各处。刘东轩和江南兵工学校的同学一起，不怕张敬尧“战时戒严令”的威吓，手持“誓必争回青岛”、“毋忘国耻”、“莫买日货”的旗子，列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张敬尧极其惶恐，于是大肆搜捕“过激党”，企图解散学生联合会，并令各校恢复秩序，照常上课。在江南兵工学校，也张贴着“省长训令”，那上面写着：

“……近自青岛问题发生，京津学生多所误会，停课要挟，聚众游行，蔓延沪宁，牵及鄂渚。我湘省学生素持镇静态度，及近为潮流所撼，亦不免转入漩涡，三数日间踵及罢课。……国势积弱，外交孔殷，正赖学生殚精学业，砥砺琢磨，务求精神上之爱国，勿为口头上之爱国，以期养气待时，储为异日干城之用。若激于一时意气，抛弃常业，牺牲光阴，逾越范围，扰乱秩序，名为爱国，实以祸国。……”

刘东轩看着这纸“训令”，怒火中烧。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青年，竟然跳上台阶，向着众多的学生，指着省长的“训令”，厉声说：“看啦！督军大人劝我们殚精学业，可是我们的学校都住着他的大兵，我们到哪里去‘殚精学业’呢？他劝我们砥砺琢磨，可是学校的经费充作了他的军饷，我们拿什么去‘砥砺琢磨’呢？长沙的学校停课，关门，我们学校也是只工不读，没有经费，现在是一天也‘磨’不下去了！国势积弱，外交孔殷，正赖我们有血气的青年振奋爱国热情，苦志匡时，督军大人却给我们

加上抛弃常业，牺牲光阴，逾越范围的罪名。有国不能爱，祸国不能讲，同窗学子们啦，我们还能按照他的训令，‘翻然觉悟，照常上课’吗？！”

在场学生个个气愤填膺，唰唰几下，把“省长训令”从墙上撕了下来，扯得粉碎！

江南兵工学校依旧罢课，还排演了新戏，准备公演。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出版了。它象漫漫长夜里亮起的一支火炬，照亮了青年们前进的道路。刘东轩兴奋极了。在寒凝大地之时，他象报春花一样地萌发了。他决计停学，遵照毛泽东同志“唤起民众”的指示，投入到工农队伍中去。他满怀希望地说：“人心不死，国尚可为，中国革命的路，将在农工大众中开拓出来！”

第二章 水口春雷

在人间地狱

一九二〇年，刘东轩来到水口山铅锌矿，被分配在机械科当钳工。

水口山位于湘江上游东岸，是我国重要的铅锌产地，曾有“铅都”之称。相传在九百多年前就已破土开发。一八九六年，正是水口山处于“黄金时代”之时，清王朝把它正式收归“官办”。封建统治者想在这里开辟“利源”，“冀辅库藏之所不逮”。那时，官绅们骑马坐轿，纷至沓来；英、美、法、德、日、比等帝国主义国家，也趁机而入，相继把洋楼修上了水口山荒凉的山岭。法国的华利公司，英国的亨达利、安利英洋行，德国的礼和、瑞记、隆记洋行，美国的太平洋实业公司，比利时的湘江、湘利公司等，把水口山当作一块肥肉，争相切割。据记载，从一九〇五年以后的二十七年中，帝国主义掠夺水口山的矿砂达八百多万担，占这期间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三以上。于是，水口山的“黄金时代”，象梦幻一样，转瞬即逝。

现在，展现在刘东轩眼前的水口山矿，已经破烂不堪。山体经历代开挖，受戕已深，许多明窿（即露天矿）早已荒废，岩壁崩塌，积水浑浊，只有废石堆积而成的一座座小山，表明过去开发的规模。这些，仿佛给刘东轩翻开了矿山以往的历史。如今，在废窿的旁边，竖起了钢铁井架；蒸汽机在火砖砌的房子里“扑扑扑”地喘着粗气，象拉碾盘的老牛在喷鼻一样；明灭相间的“瞎

子电火”，终于代替了油灯。除了这些象征现代工业的标记以外，劳工们则是官绅们不用维修的活机器。矿里采取封建包头制的生产管理体制，破产农民、扔了挑子的手工业者、讨饭的乞丐，被把头、监工以每天不到三升糙米的代价，在木棍竹片的鞭笞下，钻入不见天日的窿道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甚至达十八小时，有时还要遭受板臀、踩杠子、熏香火、打雷公尖、吊半边猪等残酷的刑罚。工人的工饷，矿局常常拖欠不发，将它存入银行，以生余利，就在东轩到达水口山的前一年，矿局积欠工饷已达八万余元。贪婪的局长、师爷还动不动就威胁工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有！”工人们过着“打锤子，拖篓子，一天挣不到三筒霉米子，压死病死弄不到四块旧板子，妻儿子女四处逃荒当叫化子”的悲惨生活。

在刘东轩到达水口山的这一年，统治湖南的军阀赵恒惕正在运动“联省自治”。为了筹措贿赂议员的款子，聚集镇压人民的资金，他们指示湖南矿务总公司协理胡瑛，将水口山铅锌存砂假名废砂，全部贱价卖给英商安利英洋行，得现金一百三十万元。矿区内外存砂扫地一空。此外，又立约预售待产矿砂，已抛出而未交货的黑铅、白铅砂共达十余万吨。按照矿山每月的出产，反动统治者的算盘，一下便拨过了五年。

井架就是摇钱树，砂湖便是聚宝盆。资本家为了孝敬其主子赵恒惕，真恨不得把这“摇钱树”和“聚宝盆”里的一沙一石都榨出油来。

在窿道甲层有个老砂湖，顶棚上张着开了口的松石，片邦上立着危岩。在长十数丈、宽两百步的砂湖中，连根架木也没有。几根倾斜的矿柱，剥落得象几条瘦牛腿。一天，把头王继前逼着七个矿工到这个荒废多年的砂湖去打矿砂。工人们明知此去必然送

死，都不肯去。王继前便凶恶地吼道：“离了这条死路，不见得就有你们的活路。不愿打的，悉听自便！”矿工们知道，饭碗放在人家的脚背上，只要他一抬脚，就会仰翻，如今眼前就是阎王殿，也得舍命走进去。他们用三根木头支起一个作业台，开始用开火（小钢钎）和炮钎打眼。突然，顶棚上发出几声撕心的怪响，跟着下起了急骤的碎石雨。挂在片邦上的油灯（临时作业区仍然用它照明）飘了飘火尾巴就熄灭了。这是大冒顶的危险讯号。七个工人赶紧撒腿就跑，但松石已砸了下来，声如旱天惊雷！当附近探巷、砂湖里作业的矿工闻声赶来时，只见砂湖中一块足有半亩大的巨石，把七个工人全压在底下了。岩板上摆着碎骨，矿砂里粘着肉浆，浅灰色的岩浆水被血染成一滩紫黑。矿工们用竹片把粘在矿砂、岩石上的肉浆一点点刮下来，分成七份，用草纸包了，捧着它，默默地走出了窿道口。

这是刘东轩进矿后看到的第一幕悲剧！

是矿山，还是人间地狱？刘东轩狂怒了！他对机械科的工友们说，“水口山的局长、师爷，一个个都是白花花的银菩萨，可是他们的心却比铅砂还要黑！我们必须跟他们进行斗争，争得我们生存的权利！”

大闹油米处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水口山工人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下，“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生命毫无保障，不能不奋起斗争。

在老鸦巢的半边街上，有一家门面较大的铺子，叫“水口山